

22

永川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七輯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永川市委员会
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

永川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七辑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永川市委员会
学 习 文 史 委 员 会

2001年12月

书名题字：彭在村

封面设计：周秀银

内 部 发 行

准印证号码：005841

工 本 费：5.00 元

承 印：永川市廷超印刷厂

日 期：二〇〇一年十二月

本辑编审人员：

主 编：胡尚知

责任编辑：李蓝天

主 审：张明清

审 稿：蒋廷举 屈景益

校 对：李蓝天

目 录

从放牛娃成长为司令员的蒋国钧·····	张义富(1)
进军大西南的二野敌工部·····	欧阳儒炳口述 谢洪卫整理(5)
朱明仙先生事略·····	彭万国(22)
李焕章·····	刘 芳(26)
创建驻非使馆始末——忆杜攻外交生涯片段·····	杜家铜(29)
“王政策”其人其事·····	龙安中(31)
永川剿匪·····	林隆华(39)
重庆军统特务头子段楚田潜居永川就擒记·····	罗敦才(55)
永川匪首宋双覆灭记·····	易进武(62)
郑东琴救父·····	邓崇仕 (65)
旧事钩沉·····	龙 飞(67)
永川高产路劳动琐记·····	徐正经(72)
我所了解的清查敌伪档案工作·····	屈景益(80)
永川上游恐龙化石发掘纪实·····	王昌文(86)
历史文化瑰宝——永川汉代崖墓群·····	王昌文(94)
永川书法家协会·····	邱启亨(97)
永川中学百年校庆活动·····	彭万钧(105)
记忆中的珠玉小学·····	彭万国(115)
永川乡镇文化站的建立和发展·····	张炯和(118)

回忆永川修建三座中型水库	唐继林 阳正明(121)
永川的豆豉和皮蛋	秦文玉(127)
王厚卿经营有方	宋君良(132)
萱花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实现小康	杨永富(134)
旧时民俗杂谈续篇	蒋廷举(136)
浅谈松旣袍哥	龙安中(159)
往事漫忆(待续)	邹隐樵(163)
高允斌二三事	
“二十一军特委会”反共梗概	

从放牛娃成长为司令员的蒋国钧

张义富

蒋国钧，原名蒋廷隆，1916年4月8日出生于永川县九龙乡（今金龙镇）蒋家院子。家境贫困，从小割草、放牛，仅读两年小学，即在家做农活。1935年4月，为了谋生，与邻居熊金成一道挑枳壳到川北贩卖，行至安岳，遇上开往汶川去打红军的四川军阀杨森部队，被拉夫。白天给他们背背夹，或挑枪弹，稍走慢了或滑倒了，不是挨打就是挨骂；晚上，被集中关在一间屋子里，拉屎拉尿都不准离开，过着囚犯一样的生活。想逃跑，但看管很严，找不到机会。1935年7月，遇上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后开始长征的红四方面军，才被解放，被编入补充团受训。

参加红四方面军

蒋国钧通过红军的教育，知道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谋利益的队伍，于是报名参加红军，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7团当战士，随部队去天全、芦山、丹巴，与四川军阀部队作战。

当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，遂分三路北上。蒋国钧所在部队分在左路。在开进时，左路军不听中央会议决定，将部队转向南行，意图建立川西根据地并另立中央。在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，反对分裂的呼声占了上风，部队继续北上，于1936年10月底，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，进行整训。蒋国钧被调入红军大学教导队学习。1937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，后来红军大学改

/ 为教导师，住甘肃省庆阳县。

到一二九师随营学校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8月22日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教导师解散，蒋国钧被分配到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机枪连当排长，到达山西辽县后，随营学校分散扩军。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抗日号召，踊跃参军，随营学校扩充了4000多人。蒋国钧升任连长。

到平汉路抗日游击纵队

1939年，蒋国钧被调到平汉路抗日游击纵队一团一营任营长，在平汉铁路西侧打击日寇。在1940年中，连续粉碎了日寇的9次大围攻，在山西榆次的关家脑，消灭日军1个联队，生俘日军1500多人，后来参加百团大战，向日军占领的石家庄娘子关到榆次一段进攻，摧毁了日军沿线据点，歼灭了沿途的敌人，缴获了不少物资补充自己。

回太行山一二九师

1943年，蒋国钧被调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，参加整风、审干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蒋国钧离开党校回到太行山一二九师六纵队任副团长；1947年，任52团团长，参加了冀晋战役，出击南封、太阳湖、羊山等战斗，二次负伤（为三等甲级残废）。

随“二野”跃进大别山

1947年6月随“二野”跃进大别山。1948年到河南南阳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，10月参加淮海战役。蒋国钧率领52团

缴获山野炮 10 余门、俘敌 4000 余人，受到纵队嘉奖。

在渡江战役中

1949 年 4 月，蒋国钧率领第 52 团参加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战役。该团在安庆之东首先登陆，突破敌第 55 师防线，继而扩大突破口，攻占贵池县。纵队授予该团第二连“渡江第一船”光荣锦旗。该团乘胜追击，攻占了绩溪、徽州，追到建德、兰溪、金华，截断浙赣铁路，又攻占了义乌、永康，配合友邻部队解放浙江省，配合“三野”解放南京、上海。

参加解放重庆战役

其后，蒋国钧调第三兵团 12 军 34 师 100 团任团长，于 10 月奉命向西南进军。从南京乘火车去武汉，在沙市稍作休息，首先攻克湖北石首，湖南大庸，接着迅速攻占四川秀山、彭水，一直攻到江津，守敌一击即溃。此时，长江北岸胡宗南一军正在布防，该团以夜袭战法，突破敌一军防线，占领璧山，截断了重庆守敌退成都的去路，迫使杨森部改道南充去成都。该团配合友邻部队解放了重庆，俘敌 6000 余人。

参加解放成都战役

1949 年底，蒋国钧团随第 12 军 34 师，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，日行 200 余里，经永川、内江，攻占仁寿、彭山，继而迅速攻克邛崃、大邑。截断了胡宗南部的退路。第二天，胡宗南改由成都向云南撤退，蒋国钧团在邛崃一线阻击敌人，经过两天一夜艰苦战斗，配合友邻部队全歼企图逃跑之敌，俘敌 6000 余人。接着，配合“一野”解放了成都。该团因作战有功，受到纵队嘉奖。

到川黔湘边境剿匪

成都战役结束。1950年1月回师川东，第34师警备重庆。蒋国钧团住江北警备兵工厂。因土匪猖獗，9月，配合友邻部队到川黔湘边境剿匪。经过两个多月清剿，将土匪肃清，共俘匪2万余人，缴获各种枪枝5000余件。

参加抗美援朝消灭土耳其旅一部

同年12月，蒋国钧团奉命参加抗美援朝，于1951年3月10日跨过鸭绿江，进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。经过连续急行军，到达谷山、伊川，立即参加第五次战役。任务是突破敌500高地，配合友邻部队消灭伪一师、美三师、土耳其旅。该团战士英勇奋战，连续出击，突破了敌人阵地，消灭土耳其旅一部，迫使敌人向老洞、栗阳撤退。

1952年，蒋国钧被提升为第34师副师长，在汉江北岸攻击572.4高地美军三师九团阵地。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，攻占了全部阵地，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。此后，以坑道战为主，结合野战工事，在“三八”线一带组织防御至朝鲜战争结束。

任杭州军分区司令员

1954年，蒋国钧随部队回国住金华，升第34师师长。1955年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，获大校军衔；同时，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、三级“八一”勋章。1957年，在军事学院毕业后，仍回第34师任师长。

1963年，蒋国钧调杭州军分区任司令员。后因身体不好，离休，享受正军职待遇。

1992年3月16日，蒋国钧病逝于杭州。

进军大西南的二野敌工部

欧阳儒炳口述 谢洪卫整理

1949年1月10日，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，国民党军五个兵团和一个绥靖区的部队共55万5千人被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。战役中，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、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被击毙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、徐州“剿总”副司令杜聿明等一大批高级将领被俘。这次战役的胜利，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、中原广大地区，把炮口直接瞄准了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——南京。

在战役结束后部队休整期间，我所在的中原野战军于二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，辖第三、第四、第五三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，刘伯承任司令员，邓小平任政委。野战军政治部辖组织部、宣传部（含新华社分社）、保卫部、敌工部，我当时在敌工部任干事。另外还设立了高俘管理处、秘书处等部门。政治部主任由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兼任，陈鹤桥任组织部长、陈斐琴任宣传部长、刘秉林任保卫部长、杨松青任敌工部长。

3月，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，决定了我党对取得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。面对蒋介石一面玩弄和平阴谋，一面加强长江防线，企图保存残余力量，苟延残喘，我军也作好了横渡长江，直捣蒋家王朝的政治中心南京的准备。4月20日，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，国共谈判破裂。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：打过长江去，活捉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。21日清晨，第二、第三野战军

和地方武装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工具，在西起湖口，东至江阴长达 500 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，摧毁了蒋介石的最后防线——长江天堑。23 日，南京解放，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。随后，我军以摧枯之势迅速前进，于 5 月 3 日解放杭州，27 日解放上海。国民党军 46 个师，43 万人成了蒋家王朝最后垂死挣扎的殉葬品。渡江战役的胜利，为我军进军华南、西南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，加速了全国的解放。

一、敌工部部长杨松青

杨松青部长是 1925 年在黄埔军校入党的老同志，带兵打过仗，做过党的地下工作。他为人光明磊落，胸怀坦荡，对部下关怀备至，细心培养，常把自己漫长的革命经历传授给青年干部，所以部里的同志们都很尊敬他，爱戴他。

1949 年 4 月 28 日，我们敌工部刚入驻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党部，杨部长就对我们说：“进城了，要严守纪律，提高警惕，不要被花花世界腐蚀了。我们要接触一些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，要学会待人接物。”很快得知，二野和一野、四野的一部要进军大西南。敌工部立即着手搜集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资料。5 月 10 日和 16 日，二野军事政治大学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刊登了招收广告和招生简章，招收大批青年学生入伍，以组建西南服务团。敌工部尹超凡科长和吕英干事被派去京、沪、杭地区参与招收工作。

6 月底，刘邓首长命令敌工部及情报处部份同志迁往武汉市。出发前，刘司令员向杨部长交代了任务，邓政委还要求杨部长想法把渡江前留在中原的“豫剧团”要回来。经作工作，“豫剧团”要了回来，并随二野进军西南。7 月初，我们抵达汉口的第三天，四野司令员林彪来看望我们。杨部长向林彪转达了刘邓首长的问候，并作了简单的工作汇报后，林彪问：“你们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没有？”杨部长回答道：“我们只带了一部中吉普，还

需要一部小车。”第二天，林彪就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一部美式小吉普车。10月份，我们离开武汉时，杨部长还特地向林彪辞行。

在汉期间，成立了由敌工部杨部长、司令部情报处长柴成文任正、副部长的联络部，统一部署二野进军西南的前期工作。这段时期，西南各省地下党的同志也陆续来汉，记得有重庆市的肖泽宽、刘兆丰等同志。我们和地下党的同志研究了国统区一些国民党将领为了自身的前途，开始与我党接触的动态。

自解放战争以来，杨部长身边一直带着一套黄埔军校同学录，上面记着一批国民党军将领的名字，每当被我军击毙一名，他就上面该人的名字上划一把“X”，俘虏一名就打个“O”。只要刘邓大军打了胜仗，俘虏了某高级将领，他就准备上四菜一汤，陪被俘的老同学吃顿压惊饭。杨部长对被俘的团以上的军官都要亲自作说服教育工作，和他们拉拉家常，叙叙旧情，再谈谈形势，让他们认清方向，从反动的国民党阵营回到人民的阵营来。杨部长在同他们交谈中了解到不少蒋军的动态和情况，为刘邓等野战军首长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和建议。一些被俘军官经他感化教育后为我军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，如在中原战斗中被俘的一名苗族师长，经教育后表示愿为人民立功。在我军进军西南路经湖南永绥时，当地少数民族对我军不了解，加之国民党的反宣传，苗族人全跑到山里去了，我们一些掉队的同志被他们剥衣服的事件时有发生。杨部长立即动员这位苗族师长上山去作工作，经他宣传我党政策后，永绥城乡少数民族很快打消了顾虑，纷纷走下山来，背篓担筐赶集的人也多了，“剥衣服”事件也再没发生。部队在永绥住三天，军民关系很融洽。原国民党军师长杨天民被俘后，杨部长以诚相待，耐心教育，使他不但愿意入川做工作，还成立了民立轮船公司，为我军运送了不少部队急需的物资，后来他还被特批为我党特别党员。1946年在滑县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孙震部104旅旅长杨显明等川军高级军官也陆续

被派入川，为我军做了不少工作。

二、向大西南挺进，刘邓首长说：西南是个好地方

南京解放后，广大指战员认为，这下可以休整休整，在江南安家了。江南是全国著名的“鱼米之乡”，素有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、“两湖熟，天下足”的美称。由于二野这二、三年以来都是离开自己的家乡，无后方作战，指战员们长年南征北战，流血牺牲，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，进驻南京等地，在这么好的地方安家，这当然成了指战员们的愿望。

但过了一个多月，中央命令二野要进军大西南。这个命令一下达，一些指战员在江南安家的愿望破灭了，不光是一般的战士，就连一些团职干部在思想上也一下子转不过弯来，想不通，闹情绪。二野司令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机关相当一部份工作人员思想也想不通，认为苦了这么些年，还没睡个安稳觉，又要向西南进军，为什么不让其他兄弟部队去，偏偏就是我们二野？当时部队里传说西南地区落后、贫穷，条件恶劣，蚊子有青蛙那么大，蚂蝗有半尺长，满山遍野都是，还有什么闻着就死人的瘴气，这瘴气比日本鬼子的毒气弹还厉害等等，闹得战士们心绪不宁，情绪低落。后来，刘邓首长得知这些情况，引起了高度重视，决定对部队进行进军前的动员，解决指战员们的思想问题，丢掉包袱，轻装前进。

刘邓首长首先在二野直属部队、直属机关进行动员。刘伯承司令员在动员会上说：“四川、云南是个好地方，我就是四川人，邓小平是四川人，陈毅司令员也是四川人。我们的家乡并不比其它省份差，四川素有‘天府之国’的美称，物资十分丰富。云南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穷、落后，云南四季如春，也是个好地方。”刘邓首长还说，我们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，还有西南被蒋介石盘踞着，我们不去解放谁去解放，中央把解放西南的重任交给我们二野，这是我们的光荣。不管今后我们要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

作为军人就必须服从命令。经过刘邓首长的亲自动员，直属部队和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思想通了。

随后，各兵团、各军、各师按照刘邓首长的批示，进行了层层动员。广大指战员思想觉悟是比较高的，经过动员，大家思想通了，情绪高涨，精神饱满了，积极作好准备，随时向大西南挺进。

进军大西南前的思想动员，解开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包袱，鼓舞了士气，为挺进作好了思想准备。

三、刘司令员说：要争取更多的国民党部队起义

1949年6月底，到达汉口以后，我们先入住璇宫饭店，因其地处繁华的中山大道，各类人员进出频繁，不利于我们开展工作，为了安全，部份带有电台的同志移住东方饭店。

我们到汉口的主要任务就是做策反工作，动员国民党的部队起义。因此，我们一到武汉，就先和西南的地下党取得联系，通过他们了解掌握西南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兵力部署和各种情况，然后根据掌握的情报，开展针对性的工作。

8月份，刘司令员秘密来到汉口，与林彪商讨军事部署后，对杨部长说：西南地区敌人的兵力还有90多万，而我们进军的部队不到60万，要争取更多的国民党部队起义。

策反工作是相当严肃、复杂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，一点马虎不得，必须十分谨慎、细致，不允许出任何差错。如果出了问题，就不是一般的问题，那是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生命的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在工作中都十分小心，非常谨慎，一方面要做好真心实意来谈判的国民党军代表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又要严防敌人使反间计。凡是国民党军某师、某军或某军团派人来接头联系的，我们都表示欢迎，但我们还要通过地下党，通过各种关系了解这个部队或这个人是否真正想起义，作出正确判断和选择。

我们的策反工作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大部队，如针对国民党

的一个军、一个兵团或一个地区的驻军进行策反工作，动员他们起义投诚。国民党军主要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组成，我们主要针对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开展策反工作，因为动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起义是比较困难的，当然，如果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确有诚意，我们也欢迎。

对于和我们谈判好、确实要起义的国民党军队，都有指定的电台专门联系。比较大的部队，我们都要求派我们的工作人员到他们部队去，以便准确掌握情况，开展工作。但首先要求保证我方人员的人身安全，给予公开合法的军人身份作掩护，并保证我方的报务员能正常使用带去的电台，保障通讯畅通。如四川的刘文辉部、邓锡侯部、潘文华部，云南的龙云、卢汉部，我们都派去了工作干部，带去了电台，以保证起义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经过艰巨的谈判，如果成功，达成协议，我们便安排起义方式、时间、地点，通知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在我们指定的时间、地点起义。起义时间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关系到起义的成败，如果起义时间选择早了，我们的部队没赶到，起义部队容易被国民党军其它部队歼灭；晚了，不能配合我方部队作战，贻误战机。当时，蒋军的电台每天对我方部队的行动都有通报，敌人的行动和部署我们也了如指掌，因此选择起义的时间要跟我军行动配合起来。一般说，起义时间距我方部队到达该地区二、三天时间为宜。

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在起义时，必须发表通电，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，拥护人民解放军的各项政策。向全国发表通电：某某率某部，多少人，于某年某月某日起义（通电起义的人数往往与实际人数有一定差距）。

起义部队起义后，我们要求要严格地控制起义部队，因为一个大兵团起义，不一定全军上下都愿意，不愿意的就想往外跑，说不定这一跑，就可能导致起义失败。所以，为了确保起义成

功，我们要求起义将领必须严格控制自己的部队，保持高度警惕，严密注意起义部队周围的动态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。这是由于起义部队左邻右舍还有国民党军没有起义的部队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联合袭击已起义的部队，甚至消灭起义部队。

在策反工作中，我党在国民党部队的地下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，为策反大批国民党部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1948年冬淮海战役期间，接中央军委指示，杨部长与范子明取得了联系，范子明是杨部长黄埔军校的同学，抗战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军166师上校政治部主任，在山西经徐向前与我党接上关系。解放战争期间仍以少将高参的身份作掩护委身于国民党部队。1949年12月，二野指示范子明由香港秘密前往昆明，利用其旧部关系策反昆明地区的国民党部队。范子明到昆明后住在一家棉纱行里，在外与军界来往主要由国民党军第8军170师师部中尉副官乔秀中协助（乔在1950年随田仲达部起义）。12月9日，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，扣留了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26军军长余程万等一批国民党要员。12月17日，驻扎在昆明城外第8、第26军及国民党军中央炮校的两个炮兵营向卢汉守军发起猛烈进攻。范子明以卢汉方面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与城外敌军多次谈判，经协商先后释放了李弥和余程万。由于第8军代军长曹天戈和26军彭佐熙的逼迫，这两支部队没有起义。但在卢汉守城最困难时，26军出人意料地撤出了战斗，客观上起到了有利于卢汉的作用。余程万逃回台湾后，不久便被蒋介石枪毙。解放初期，范子明在协助二野4兵团维护昆明治安的工作上起了很好的作用，后担任云南省政协常委。

根据形势的需要，我军一些政工干部也陆续进入国统区。林蜀秀和朱德钦就是其中的两位。为了参加革命，他们放弃了大学学业，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成都。林蜀秀的父亲是当时国民党四川省保安副司令，他便利用这种关系，在国民党军界上层进行活